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前苏联〕鲍里斯·皮利尼亚克 著

顾永忠 译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第一章

黎明时分，城市上空响起了工厂的汽笛。浮游在小巷里的阴冷灰暗的夜雾在晨曦中渐渐消散。这就是说，今天的早晨一定是沉闷的，灰色的，雾蒙蒙的。此刻在报馆的印刷车间里，轮转印刷机很快就要把当天的报纸印出来了，再过不大工夫，报童便将挟着大叠大叠的报纸走出发行科的院子，奔散到各条大街，在空荡荡的十字路口高声叫喊：

“中国发生革命！欢迎红军统帅加弗里洛夫到来！红军统帅来市就医！”报童一面喊叫，一面清嗓子，因为他们要叫卖一整天。

与此同时，一列特快开进了专门停靠南方来车的车站。这是辆专列，还拖着供办公用的熠熠发亮的瓦蓝色尾挂。办公车厢无声无息，车门口踏级上站着哨兵，锃亮的玻璃窗后垂着厚厚的窗幔。列车来自黑夜，来自蓬勃的盛夏耗尽了精力换来白雪覆盖的严冬老态的原野。列车徐徐驶到站台的荫棚底下，停在备用道上。月台上空空的。也许出于偶然，车门正好对着站在月台上加强警戒的、穿绿条镶边制服的民警。三个缀有菱形袖章的军官走近办公车厢。车上车下的人相互敬礼，三人等候在车门踏级旁边，守门哨兵朝里悄悄说了些什么，于是那三个军官跨上踏级，消失在窗幔后面。车厢中亮起了灯光。两个通讯兵在车厢旁边忙忙碌碌，从月台荫棚下把电话线接进车厢。又有一个人朝车厢走来了。他穿件半旧夹大衣，却又不合时令地头戴护耳皮帽。他不朝哨兵敬礼，对方也不向他还礼。他

说：

“请您告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波波夫来看他。”

红军战士慢腾腾地瞥了波波夫一眼，又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一番，尤其仔细地察看了他那蒙满灰尘的皮鞋，然后慢腾腾地回答：

“司令员同志还没有起床。”

波波夫向红军战士友好地笑笑，改口称战士为“你”，和气地说：

“没事，老弟，你去说吧，告诉他，就说波波夫来了。”

战士进去了一会儿，出来了。于是波波夫钻进车厢。办公车厢里因为垂着窗幔，又亮着灯，所以仍像是夜晚。桌上台灯旁摊开着一本书，放着一盘吃剩的碎麦米粥，再旁边放着开了盖儿的柯尔特手枪皮套。皮套带像条蜿蜒的蛇。桌子另一端有两只启开瓶塞的酒瓶。三个带菱形袖章的军官坐在桌旁一排靠厢壁的皮圈椅里，姿态谦恭温雅，手捧公文包，端端正正，默不作声。波波夫走到桌后，脱去大衣，摘下帽子，把它们放在身旁，拿起那本打开的书来瞧了瞧。列车员走了过来。他对眼前的一切无动于衷，自顾拾掇桌子：把酒瓶藏到车厢角落里，将石榴皮扫进托盘，然后铺上桌布，拿来一只带茶杯托的杯子，一碟干面包，一盏吃鸡蛋用的高脚杯，两只囫圇煮蛋，一撮盐，几小瓶药。在这之后，他掀开帘角，瞅一眼窗外，窗外已是早晨，便把窗帘拉开——拉帘幔的小绳可怜巴巴地吱的一响。他关灭了电灯，灰蒙蒙阴冷的秋天的早晨悄悄地钻进办公车厢。在这浑浊的晨色中，办公车厢里所有人的脸都是蜡黄的。稀溜溜、潮乎乎的光线像是浓液。侍从副官和列车员并排站在门口，响起了电话铃声，办公日开始了。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没多会儿司令员便从他的起居车厢走进办公车厢。他，不高的个儿，阔肩膀，一头往后梳的浅黄长发。缀有四个菱形袖章的军上衣是用草绿色粗呢料子缝制的，皱巴巴的，一点也不挺括。带刺马靴虽经仔细擦过，但从磨损的靴跟看来，显然穿了不少时候。这位司令员的名字标志着整个内战时期红军的英勇无畏，标志着他身后成千上万、几十万的人。他的名字也标志着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人的死亡、困苦、伤残，标志着寒冷、饥馑、酷暑下的行军，标志着火炮的轰鸣、子弹的呼啸和深夜的刺骨寒风，标志着夜间的篝火、行旅生活、胜利、奔命，再次标志着死亡。他指挥千万人组成的军队，指挥人、胜利和死亡——由火药、硝烟、白骨和横飞的血肉所构成的死亡，赢得后方千百面红旗招展和无数人民群众欢呼的胜利，由无线电广播传遍全球的胜利，这胜利后面是俄罗斯沙场上埋葬尸体的深坑，横七竖八胡乱堆积千万个肉体的深坑。围绕着他的名字演化出了无数的传奇故事，说他指挥英明，英勇善战，大胆无畏，坚忍不拔。他有驱使人们杀戮同类，驱使他们去死的权力和意志。

这位个儿不高但肩膀宽阔的司令员走进办公车厢，和蔼的脸上略带教会学校学生那种倦容。他走路很快。照那步履，既像骑兵，同时又像与军人迥然不同的文职人员。三个参谋霍地站起身来，立正。司令员走到他们跟前，并不答礼，只做了个允许稍息的手势，就这么站着听取他们一一汇报。汇报人往前跨一步，打个立正，然后说：“囑办的……”最后用“为革命效劳”的话作为结尾。司令员轮流和每个汇报的人握手，大概，汇报的内容他压根儿就没听。在这之后，他对着那只孤零零的杯子坐下。列车员立即出现在他一旁，用一只漂亮的茶壶

给他斟了茶。司令员边拿起熟鸡蛋，边问：

“情况怎样？”他说话开门见山。

三人之中的一个说了说新来的消息，接着问道：

“您身体好吗，加弗里洛夫同志？”

司令员的脸骤然一变，不满地回答：

“我在高加索接受过治疗，现在已经康复了。”停顿了一小会儿，又说：“现在身体健康。”停了停，又说：“告诉你们，不要举行什么欢迎仪式，不要派什么仪仗队，总之……”歇了口气又说：“你们没事了，同志们。”

三个参谋起身告辞，司令员就这么坐着跟他们握手，参谋们悄悄出了办公车厢。司令员进办公车厢的时候，波波夫没向他问好，而是拿起桌上的书低头翻阅，司令员只朝波波夫瞥一眼，也不答理，仿佛没看见似的。这会儿参谋走了，司令员仍旧不说一句寒暄的话，就像昨晚就已见过面似的，径直问：

“阿廖什卡，你想喝点儿茶还是来点儿酒？”

但波波夫没来得及回答，因为副官向前迈进一步开始向司令员汇报：“司令员同志……”他说汽车已从平板货车上卸下；办公室收到各方发来的函件，其中的一封是一号宅院发来的、秘书亲送的密件，他说，住所安排在总部，来了一大束贺电和贺文。司令回答他：决定在专列的车厢里歇宿。在这之后把副官打发走了。列车员不等波波夫表示意见就在桌上放了一只茶杯，一只酒标。波波夫从车厢角落里移身坐近司令。

“尼古拉沙，你身体好吗？”波波夫的问候话像对手足兄弟那样友好。

“身体吗？已经好了，完全恢复健康了，不过，没准儿你要在我的棺材旁守灵。”如弗里洛夫既像是认真说的，又像开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玩笑。但不管怎样，即使是玩笑，也是苦笑。

他俩，波波夫和加弗里洛夫，是对昔日的老朋友，一起从事过地下工作，曾在同一个厂里干活。自从刚开始，还是年轻小伙的时候，在奥列霍沃-祖耶沃工厂当织造工起开始了他们的人生，后来他们同坐过博戈罗茨克监狱，再后来同时成了职业革命家，经历流放和逃亡，共同从事秘密工作，同是塔甘监狱里待发配的囚犯，接着又是流放、逃亡，直至流寓国外，浪迹巴黎、维也纳、芝加哥。乌云翻浪的一九一四年，意大利的布林迪西，希腊的萨洛尼卡，罗马尼亚，基辅，莫斯科，彼得堡。最后来是雷鸣电闪的一九一七年，斯莫尔尼宫，十月革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隆隆炮声。嗣后一个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当赤卫军的参谋长；另一个成了雷科夫戏称的无产阶级首席贵族，留在图拉。一个忙于战争，指挥大炮和人，指挥死亡；另一个埋头于省委、省执委直至最高经委的工作，忙于开大会，作报告。对于他俩来说，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和思想，都是为了追求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世上最伟大的正义和真理。但是，一个在另一个眼里永远是尼古拉沙，另一个在这一个眼里永远是阿列克谢，阿廖什卡，他们永远是织造工同志，不受级别和军人条例的限制。

“尼古拉沙，你说说，身体究竟怎样？”波波夫问。

“说实话，我确曾犯过胃溃疡，也许现在还有。犯起病来便呕血，灼痛，疼极了。一句话，那病犯起来很可恶。”司令员凑近阿列克谢低声说。“他们把我送去高加索治疗。后来不痛了，我试着去工作。半年后又出现呕吐和疼痛，再次去了高加索。眼下症状已经无影无踪。为了试试是否真的好了，我甚至还喝了一瓶酒……”司令员说到这儿，自己打断自己的话：

“阿廖什卡，你想喝酒吗？喏，在椅子底下，给你带来了一小箱，你自个儿打开吧！”

波波夫用手掌支着头，一动不动，回答道：

“不，清早我不喝。你往下说吧。”

“这不是，你瞧，我现在好好的。”司令员沉默了半晌。
“阿廖什卡，为什么召我回来，这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

“去了封信，要我从高加索直接回来。连妻子那儿也没来得及去告别。”司令员沉默了一小会儿。“见鬼，怎么也猜不透为了什么。军队里一切正常，眼下又不开代表大会，什么大事也没有。”

司令员谈到了军队，谈到了战争。他大概没有发现，在他谈论军队和战争的时候，他不再是织造工，而是统帅，红军的将领。这位司令也没有发现，当他谈到奥列霍沃-祖耶沃和奥列霍沃-祖耶沃年代时，他又成了织造工，爱上了河对岸一位女教师的织造工。为了去见她，他把靴子擦得锃亮锃亮，为了不让尘土弄脏靴子，宁肯赤脚去学校，直到学校旁的小树林里才穿上它。为去见她，还买了一件花里胡哨的衬衫和蝴蝶领结，一顶很神气的礼帽。可跟女教师除了谈书本之外没能深入进行下去，没有产生罗曼史，女教师拒绝了他。织造工-司令员是个好人，爱开玩笑，也善于找到笑料，因而和朋友在一起说话非常风趣，只是偶或想起莫名其妙地被召回莫斯科这奇怪事来才感到局促紧张。他茫然若失地在车厢里踱着步，以棒小伙子织造工的口吻评论犯病的司令员：“当显贵，当统帅，有什么好的！连荞麦粥也咽不下……是啊，中央任意摆布人。你爱听不爱听，话就得这么说。”他说到这儿，不作声了。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尼古拉沙，你直截了当说吧，你怀疑什么？”波波夫问。
“干吗说那些守灵之类的话？”

司令员没有马上回答，思索了几下，才说：“在罗斯托夫，我曾遇见波塔普（他用革命代号提到一九一八年“光荣的一群”当中一位显要革命家）。他建议我……他想说服我进行手术，割掉溃疡，或者缝补缝补。这种说服工作真叫人犯疑！”司令员沉默一会儿。“我感觉身体很好，我打心眼里反对手术，怎么也不愿意。不再医治也能恢复健康，一点儿也不觉得痛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几乎是老头儿了，成了所谓显贵，可总惦记自己的肚子，可耻！”司令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那本打开的书。“我在读托尔斯泰这老头儿写的书，《童年和少年》。老头子写得很好。他对生活有感受，对流血……流血，我见得多了，可是……可是怕手术，像孩子那么怕。我不愿意，这能送掉我的命！……关于人血，托尔斯泰这老头儿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副官走进来，打个立正，报告说，总部来通知，说由一号宅院开来接司令的汽车已经开到，请您去那里；说又来了一些电报；说某人已派人来提取从南方来的包裹。副官说罢，把一叠报纸放到桌上。司令员让他走了。司令命令准备好大衣。司令员翻开报纸。那里，在当日重要新闻的版面上，刊登了一条消息：“红军统帅加弗里洛夫到达莫斯科。”第三版上又写道：“今天红军统帅加弗里洛夫临时离开军队来此接受胃溃疡手术。”这则报导里还说“加弗里洛夫同志的健康情况令人忧虑”，但“医生们异口同声保证此项手术必获成功”。

革命的老战士，士兵，集团军司令，把无数人送去死亡的红军统帅，开动杀戮、死亡和以流血取胜的战争机器的加弗里

洛夫此刻仰身椅背上，举手拭拭前额，炯炯有神凝视着波波夫说：

“阿廖什卡，你听见了吗？这事不简单！啊，怎么办呢？”
随后高声命令：“勤务兵，取我的人衣来！”

第二章

市内，在两条大街的交叉口处，在车水马龙的地方，坐落着一幢花园洋房。这幢带大圆柱的房子不挂任何招牌。大门两旁，狮身鹰首雕像下面，站着两个戴头盔的岗哨。行人、汽车喇叭声、群众、人的时间从府邸旁边流去，灰暗的白昼、报童、挟公文包的人、穿齐膝短裙和长统丝袜（别人错以为她们裸着大腿）的妇女从府邸旁流去，但在大门上的狮身鹰首雕像后面，时间是停止不动。城市的另一端坐落着另一幢宅院，属同样的古典式建筑，有花园，有圆柱，有耳房，有描绘神怪的浅浮雕。这幢宅院有两个大门，大门上，画有扭曲着脸的牧人保护神，门旁有岗亭，岗亭旁边的长椅上，坐着腰束围裙、脚登毡靴的守门人。他们的围裙上还别着铜号牌。大门旁停着一辆轿车，黑色车身上涂了红十字，并写有“急救车”三个字。

这一天，一家大报在《庆贺金本位纸币发行三周年》的社论中指出：“只有使经济生活建立在严格的经济核算和巩固的经济基础之上，方有可能使货币稳值。如果国家给予企业的补贴及国民经济的进展与它的预算不相称，便将不可避免地破坏严密的财政制度。”大字标题有：《中国的反帝斗争》，国际栏有英、法、德、捷、拉脱维亚和美国的来电。一篇大大方方的评论登在底栏：《革命暴力问题》。另外两版上刊登公告，有大字标题是：《生活的真实——梅毒》，《斯·布罗伊德的新书〈在疯人院里〉》。

中午时候，一辆洛伊斯牌高级轿车开进一号宅院，也就是

使时间凝滞着的那幢楼房的前面。哨兵上去打开车门，接司令员下车。

府邸深处，办公室里窗帘拉下来了，虚掩着。窗外是往远处延伸的大街。而窗内，办公室的壁炉燃得正旺。铺有红呢毯的书桌上的三架电话机，壁炉里木柴清脆的劈啪声更衬托出办公室的安静平和。三架电话机是三条大动脉，通过它，在静静的办公室里便可以指挥城市，了解城市，掌握城市的命脉。书桌上放着沉甸甸的青铜文具盘，笔架上插了一打之多的红蓝铅笔。书桌后面，办公室的墙孔里安置了一台收音机、两副耳机和一排通往各处的电铃按钮——既有通接待室的，也有发“警报”的。书桌前设有一张圈椅。就在这间办公室里，书桌后的木椅上坐着一位腰背不弯的人。窗帘半垂着，书桌上亮着绿罩台灯。这位腰背挺直的人的脸庞落在台灯阴影里，模模糊糊。

司令员沿着地毯走来，坐进圈椅里。

第一人，笔挺着腰的人：

“加弗里洛夫，我们俩用不着谈革命的残酷性了。历史的车轮，很遗憾，我是这样认为的，是靠了鲜血和死亡向前推动的，革命的车轮尤其如此。我和你也用不着谈论死亡和鲜血。你当记得，我和你曾率领几乎是手无寸铁的红军战士进攻叶卡捷琳诺夫。你手里提一支步枪，我也拿着枪，炮弹击中了你的坐骑，于是你徒步向前。战士们往后溃退，为了制止他们，你把其中的一个枪杀了。司令员，如果当时我害怕，你也会枪毙我的，而且我认为，你这样做是对的，我认为。”

第二人，司令员：

“嘿，你这陈设不赖，真像部长办公室。这儿能抽烟吗？没见有烟蒂呀！”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别抽烟，别抽，你的健康不允许。我自己不抽。”

第二人严肃地、很高兴地说：

“不需要开场白。为什么召我回来？免去外交辞令，直说吧！”

“召你来，是因为你应该接受手术。你是革命所不可少的人。我已约好一批教授。他们说，一月后你即能下床行走。这是革命的需要。现在教授们正等着你，他们会给你作体格检查并完全明白了。我已下达了命令。甚至请来了一位德国大夫。”

第二人：

“你吸不吸烟由你，可我想抽一支，只抽一只。我的医生以前对我说过，不用手术，会自动复合的。我觉得自己完全健康。任何手术都不需要，我不要。”

第一人往后伸手摸到墙上的电钮，按下铃，秘书便不言不语地走了进来。第一人问：“有人在外面等候接见吗？”秘书赶紧点头称是。第一人不作答复，让他走了。

第一人：

“司令员同志，有次我俩曾讨论要不要派遣四千人的问题，这些人去了肯定送死，你记得吗？你仍然下达了派遣令。你做得对。过三星期你就能下床了。对不起，我已下了命令。”

电话铃响了。不是市内公共电话，而是内线的。这样的内部线路一共也不过三四十条。第一人拿起听筒，听完后又问一遍，然后说：“给法国人发一份照会？那当然，要正式的，照我昨天说的那样。这你明白，你记得咱们是怎么捕淡水鲑的，法国人就像鲑鱼，滑溜溜的。怎么？是的，是的。给加点温！再见。”

第一人：

“对不起，不用多谈了，加弗里洛夫同志。”

司令吸完烟，把烟蒂塞进五颜六色铅笔中间，便站起身来。

司令员：

“别了。”

第一人：

“再见。”

司令员踩着红地毯向门口走去，洛伊斯轿车将他带进了大街的喧闹声里。办公室中只留下那位腰背不弯的人。没有人再到办公室里来。他腰背挺直，手执一支粗大的红铅笔，坐着批阅文件。他按铃，秘书进来，他说：“吩咐把烟蒂清除掉，这儿，笔架里！”说罢他重又拿起红铅笔，一声不响批阅文件。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他还是在批阅文件，埋头工作。其间来过一次电话，他听了回答：“给土耳其斯坦运二百万卢布的胶靴和纺织品去填补商品不足的窟窿吗？对，当然！对，干吧！再见。”侍者不声不响地用托盘送来一杯茶和一块餐巾盖住的冷肉，放到靠窗的小桌上，走了。腰背不弯的人又一次召来秘书，问：“秘书综合报告准备好了吗？”秘书作了肯定的回答。“把它取来。”吩咐罢，他又默默地、久久地埋头于文件，埋头于外交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政治经济处、外贸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等各类文件之中。这时，三个最高决策者中的其他两人也都跨进了他的办公室。

下午四时，几辆汽车开进了市郊的二号宅院。二号院的房子裹在昏暗里，仿佛湿露缭绕的房子靠这昏暗能焐暖似的。院门口，在系围裙穿毡靴的看门人旁边配置了两个民警，正门旁也配置了两个民警。胸挂两枚红旗勋章、腰柔如柳的红军军官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带着两个战士走进楼房。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前厅迎接他们：“是，是，嗯。”房间很大，很空旷。正中放置一张铺白漆布的长桌。在桌子两侧，如同列车的办公车厢里那样，是一溜漆布面高背椅子。靠墙有一张漆布面沙发小床，上面铺了白被单；沙发床旁有一张木凳。墙角里有个盥洗用的瓷盆。它上方的玻璃搁板被许多贴标签的瓶罐占的满满的了：有升汞，有钾皂。旁边挂着几条未经漂白的黄乎乎的毛巾。最早开来的几辆汽车送来的是内科和外科医生们，都是教授。

人们相继进门，互相打着招呼。迎候他们的还是那个高个儿、大胡子、秃顶、脸上一团和气的人——很像是这儿的主人。

洛佐夫斯基教授走上前去。他三十五岁上下，脸刮得很精神，身穿燕尾服，戴副直梁夹鼻眼镜，长一双斗鸡眼。

“是，是，是，嗯。”

光脸蛋大夫递给大胡子一个拆开漆封的信封。大胡子掏出信纸，扶正眼镜，将信读了一遍，再一次扶正眼镜，疑惑地把信交给了另一人。

光脸蛋大夫手舞足蹈地说：

“瞧，是份密件，可以说这是下的一道命令。早晨送来给我的，你们明白吗？”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全都压低声音，七嘴八舌地说：

“何必还要会诊呢？”

“我是接到加急电报赶来的。电报打给了医大校长。”

“诸位可知道，加弗里洛夫司令就是那位……”

“是，是，是，嗯，革命，军司令，公式，瞧——嗯……”

“会诊。”

这里的电灯光投下一清二楚的人影。医生们有的抓住对方白大褂胸袋上的纽扣，有的手牵住另一人的手，随后，正当他们要走进房间了……

此时门口响起举枪的咣啷声，靴跟的碰击声。红军战士打着立正姿势。那个胸佩红旗勋章、有着纤纤细腰的高个儿青年军官也和战士一样立正站在门前。司令员迅速地走进了接待室。他用手把头发往后撩了撩，又清理了军上装的领子，说：

“你们好，同志们！要我脱去衣服吗？”

此时：教授们在长桌两旁的漆布椅上慢慢地落座，把胳膊肘放到桌面上，扳动着指头，扶正他们戴的眼镜，邀请患者坐下。戴直梁夹鼻眼镜、长一双斗鸡眼的那位，也就是拿出信来给大家看的人，对大胡子说道：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是 *primus inter pares*，由您主持这次会诊吧。”

“要我脱下衣服吗？”司令员又问，同时把手伸到领口。

会诊主持者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故意装作没听见司令员的问话，自顾在主席位置就坐，有条不紊地说：

“我建议，我们先问问患者：他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病的？有哪些症状使他发现自己有病？然后再作进一步检查。”

这次教授会议后写出了一份会诊记录，上面是模糊得无法辨认的医生笔迹：

会诊记录。参加会诊者某某教授，某某教授，某某教授（共七人）。

患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加弗里洛夫公民主诉上腹部疼痛，呕吐，灼痛。两年前开始患病，但本人不知。曾进行门诊



治疗并在疗养院疗养，均无效。上述七人愿患有请求举行此会诊。

Status praesens：总的情况尚好。肺—N。心脏稍有扩大。脉快。轻度 neurastenia。除胃部外，其他器官未发现病理性改变。经诊断，患者似有 *ulcus venticuli*，必须手术。

会上推选阿纳托利·科兹米奇·洛佐夫斯基教授主刀。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科科索夫教授同意担任助手。

会诊地点：某市。日期。七位教授的签名。

只是在手术后，才从私人谈话中得知真相，实际上没有一位教授真的认为有动手术的必要，病情说明无须手术，不过会诊时谁也没有想到把它说清楚。会上，只有那个少言寡语的德国人提出过无须手术的设想，但在同事们的反对下没有坚持这个意见。从私人谈话中还透露，会诊结束，大家坐进汽车返回学者之家时，科科索夫教授，即脸上浓密的毛发几乎挡住了眼睛的那位，对洛佐夫斯基教授说道：“若是这病生在我的兄弟身上，我是不会给他做手术的。”洛佐夫斯基答复他：“这当然，但……手术并无危险嘛……”随后发动机响了起来，汽车开走了。

腰背不弯的人仍坐在一号宅院他的办公室里。帷幔把所有的窗子遮得密不透风。壁炉内重又升了火。整幢房子沉浸在寂寞之中。那寂静，似乎有一百多年了。他坐在木椅子上。他面前摊开着德文的和英文的书，他正蘸着墨水写字，写的俄文字母一个个都是直愣愣的，嵌在德国的 *Linen Post* 里，摊在他面前的书，都是有关国家、权力及政权的论著。从天花板照下的灯光现在照清了他的脸，原来是张普通的脸，也许略带点儿严峻。不过，无论如何，是张注意力集中的、毫无倦意的脸。他